

黑恶势力拿未成年人当“棋子”,值得高度警惕

本报评论员 吴迪

年至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受理审查起诉的未成年人人数分别为84人、428人、552人,2018年、2019年比上年分别增长了410%和29%。一些在案发地社会影响较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竟有满脸稚气的孩子参与其中。

暴力、抢劫、盗窃、胁迫……这些“歧途少年”的行为让人心惊、心痛。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存在对校园安全乃至一方安宁来说,就是一枚枚“定时炸弹”。及时“拆弹”,无疑是全社会必须高度关注且着力解决的问题。

未成年人犯罪率走高,从数字上看,与打击力度持续加大有关。2018年全国掀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掉的涉黑恶团伙数量较往年有明显增多,与之相应,参与其中的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比2017年增加410%;2019年专项斗争持续推进,相关数据较上年度的涨幅回落到两位数。

一些未成年人参与涉黑恶组织及犯罪活动,有家庭教育缺位的原因,比如涉嫌犯罪的孩子“普遍存在辍学”“多是单亲家庭孩子或留守儿童”等,或者家长对于青春期、叛逆期孩子的心理健康疏于关注;有学校教育欠缺、

发现异常及应对能力不足的问题,有些黑恶势力专门挑选“成绩不好”“被老师和同学忽视”的学生渗透;也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比如网游及视听产品中诸如“江湖”“帮派”等不良信息的蔓延,潜移默化影响着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交际取向,容易使其受到黑恶势力的教唆。

遏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必须有与时俱进的眼光和行动,尤其要研究当下相关案件的共性趋势。比如,黑恶势力专挑未成年人发展成员,甚至教唆其担任一些违法犯罪活动的主力,因为某些情形下未成年人可以有“免刑”的保护衣,为背后的操纵者当“挡箭牌”“替罪羊”。再如,当下互联网上的不良信息和“黑社会地下文化”,对一些“网络原住民”的未成年人造成认知错乱——江西赣州一起黑社会组织性质案件中,涉案未成年人就是通过短视频APP扩大影响力并吸收成员。这表明,一些社交软件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的温床。

黑恶势力拿孩子当“棋子”的动向,特别值得警惕。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纰漏。为此,有关

方面应全方位加固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堡垒。比如,扎实推进普法进校园等活动,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特征,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知识普及和心理健康教育;从相关案件中梳理分析共性问题 and 趋势,及早拿出应对措施,防患于未然、治患于早期;净化网络空间,剔除不良文化浸染,打造真正的互联网“青少年模式”。

近年来,相关地方和部门也在积极行动。去年4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发布《关于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意见》,明确提出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9种情形从重处罚;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加了“网络保护”专章;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了“父母应树立优良家风培养未成年人良好品行”“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干预”等;各地依据实际,对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高发领域,实施重点监管,等等。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面对黑恶势力将黑手伸向未成年人,我们必须有决绝的态度和霹雳的手段,坚决遏制这种趋势的发展,引导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守护一方平安。



彭冰

“从小,妈妈就对我说,上天为你关上一扇门,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是很多热心人的帮助,让我有了一技之长,为我的生活打开了希望的窗。”脑瘫男孩小恺的话,让人心疼,心动,又心暖。

从自卑自闭的脑瘫患者,成长为阳光向上的网红“巧手”——追寻小恺成功“逆袭”的人生路径,作为记者的我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温暖和感动,也对城市困难职工的解困脱困工作有了一些思考。

小恺来自一个经济拮据的单亲家庭,母亲长期从事清扫公厕的环卫工作,收入微薄,自身患有慢性病,还要带着小凯四处求医、做康复训练。母子二人因买不起房子,寄住在老人家中,而小恺的姥姥姥爷也年近多病,其家庭属于典型的城市困难职工家庭。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是各级工会组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关系到困难职工的生活和福祉,更关系到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国家大计。小恺在吉林敦化市总帮助下成长的故事、脱贫困的故事,对于各地工会的相关帮扶工作有一定启示意义,也将使更多城市困难职工汲取解困脱困的动力和能量。

比如,帮扶城市困难职工,不能停留于两节送温暖、发放慰问金、购买慰问品等常规举措,而要在深入进行入户走访的基础上,认真倾听困难职工心声,努力探求更加精准的帮扶途径。同时,要下足功夫,不离开持续跟踪施策,构建起常态化的帮扶机制。可以说,精准施策、真情服务、持之以恒,是做好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的关键,正所谓“职工有所呼,工会有所应”“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比如,对困难职工的帮扶要形成合力,全面整合运用各方资源,积极探索创建“一人困难,多方相助”的扶贫帮困体系。为帮助小恺一家,当地市总协调住建局帮助解决廉租房事宜、协调职业技术学校为其提供免费学习机会、协调市残联的创业就业基地对其“手把手传艺”,并调动各企事业单位工会组织乃至全市职工的力量,将爱心汇聚为暖流。这提示我们,当救济救助、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诸多部门的资源可以实现共享,工作可以有效衔接,慈善机构、爱心企业等社会力量能够广泛参与,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路会走得更顺畅。

再如,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还要注重激发困难职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内生动力。小恺的“逆袭”很重要的一点是,经过工会组织的思想动员和不断鼓励,他能顽强克服疾患,在学艺闯关的道路上咬牙坚持,不向命运低头,感动了帮助他的人,也激励和感动着更多人。“自强者,人恒强之”,这种良性循环才能带来更可持续的、更彻底的解困脱困。

时至今日,虽然小恺家按照相关标准已经脱困,但工会的帮扶仍在继续,小恺那句“感谢一路上有你们陪伴,我会继续加油的”,也让人们对其未来的生活和发展充满信心和希望。

小恺的故事或许只是各地帮助城市困难职工脱困困的一个缩影。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为了预防一些家庭、职工因为疾病、事故、失业等原因,成为新的困难职工家庭,同时为了做好减少相对贫困方面工作,各级各地工会有必要认真总结经验做法,不断完善相关帮扶办法和机制,书写新的帮扶故事,让广大职工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被隔离员工设“慰问办”是一则暖新闻

丁慎毅

据光明网等媒体报道,1月5日,江苏南京的庞先生到河北石家庄出差,结果碰上疫情被隔离。20多天过去了,庞先生的情绪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公司随即成立了一个慰问办公室,陪吃、陪聊,缓解庞先生的郁闷情绪。公司负责人表示,“往后所有出差的同事,如果遇上疫情被隔离的情况,我们办公室要与他们时刻保持关注,确保他们的安全 and 身心健康。”

对于上述公司的做法,不少网友纷纷点赞。虽是个案,但这则新闻所反映出的企业对劳动者健康的重视程度,无疑是更值得关注的话题。重视员工健康,不仅是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和时段中,更应该是企业日常工作和管理的一部分。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的相关绿皮书指出,过度的工作压力、快速的工作节奏导致患病率上升,疾病年轻化态势日趋显著。建议多管齐下,完善员工健康管理制度。

对于劳动者健康权益的保障,我国已有较完善的制度安排。如我国现行的劳动法律法规要求用人单位应当控制职业病危害因素,采取工程技术、个人防护和健康管理等综合治理措施,改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

国内首部地方性健康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提出,要推进用人单位实行工间健身制度,在工作场所设置适当的健身活动场地、设施,为员工健身提供场地设施条件和时间便利,员工自觉参加年度健康体检。同时,用人单位应当对脑力或者体力劳动负荷较重的员工实行轮休制度,避免对员工健康造成人体机能过度损耗或者身心健康伤害。

没有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就没有企业的健康发展。重视劳动者的健康既是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企业为劳动者提供健康保障,既能减低劳动者患病风险,还能保证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稳固人心,进而减少人才外流,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

目前,一些企业已经建立了劳动者健康管理机制,将劳动者健康状况、健康指数纳入企业管理的一部分。在这个疫情尚未散去的冬天,上述公司关爱、重视员工的人性化举措让人倍感温暖,期待更多企业都把员工是否身心愉悦、健康当成企业的大事之一,不断做实做细做到位。

给留守儿童配“照护人” 让就地过年的务工者心安

戴先任

近日,黑龙江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全力确保每一名父母就地过年的留守儿童都有明确的被委托照护人妥善照料。各级民政部门要为农村留守儿童开展心理疏导、学习辅导等关爱服务,帮助其过好春节、过好寒假。

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为减少人员流动、聚集,各地都提倡就地过年。对于很多外出务工人员来说,就地过年很可能意味着,阖家团圆的日子要跟亲人分隔两地。而不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其他亲人已经殷切期盼了一年,希望在春节里一家人团圆。不能返乡过年,对他们来说是不小的遗憾。

当然,就地过年并非强制性措施,而是一种倡导。但如果想让更多人响应、配合这种倡导,就需要拿出更多硬核措施,比如,一些地方已经拿出了“真金白银”,为选择就地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发放“春节红包”,推出了改善就餐条件、安排文娱活动等丰富、多样的措施。与此同时,消除就地过年人员的后顾之忧也是相关地方和部门应该考虑的问题。

此次黑龙江从做好底数排查、落实监护责任、开展关爱服务、畅通救助渠道、落实疫情防控5个方面开展困境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工作,让留守儿童过上一个好年,无疑是一项精准的解除后顾之忧的服务,值得肯定与称赞。

应该意识到,倡导就地过年,不光是要服务好务工人员本人,还要看到站在他们背后的老家亲人。要让外来务工人员就地过好年,也要让他们留守家乡的亲人过好年。某种角度上,让留守家乡的亲人过好年,更有助于务工人员异乡过好年。

关心关爱留守儿童,让外来务工人员能够更安心就地过年,也会让就地过年的倡议产生更好的效果。这是一种民生温暖,是关心关爱留守儿童的必要民生举措。

化解疫情影响下的民生痛点,从全局出发、站在民生立场,力求全面解决问题,不留死角和空白,才能更好助力疫情防控,助力整个国家的秩序和安宁。

弓长

据近日《半月谈》报道,四川省德阳市下辖的绵竹市、什邡市等地化工企业集中,耕地镉污染严重,几年前当地出产的镉超标大米更给居民带来“痛病”困扰。而在当地,镉超标大米销售链几乎公开化,成为无良商家堂而皇之的牟利手段。目前,公安等部门已介入调查。

作为重金属元素,镉对人体危害极大,会损伤肾脏和骨骼。化工企业排污,其中的镉顺水流入附近稻田,是大米镉超标的主要原因之一。德阳作为全国四大磷矿生产基地之一,耕地污染严重堪称宿疾。此前,发生在广东韶关、江西九江、湖南益阳等地的



G图说

“钓鱼促销”

据《光明日报》报道,近期,一些在线教育平台被传运营困难、面临破产倒闭的情况,中消协及部分省市消协组织接到了大量来电反馈和求助。有消费者表示,有的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后仍大肆宣传、收款卖课,甚至跑路前促销,导致“交了好几万块钱,孩子一节课都没上。”

一些在线教育平台的夸大宣传、预付卡乱象,及课程“掺水”等现象,早就被口诛笔伐过,此番“跑路前促销”性质更为恶劣。“赢在起跑线”等教育焦虑让良莠不齐的在线教育市场和校外培训机构抓住了家长的软肋。规范教育培训市场,不单单要在硬件上把好这些机构的资质关,更应在其宣传推广、质量等方面做好日常的监督管理。当前,有关方面对预付式模式已开展较多的监管探索和尝试,期待更有针对性、约束性更强的措施能够及时跟进。遏制不良营销行为,既是规范市场良性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家长权益、净化教育培训土壤的要求。

赵春青/图 嘉湖/文

决不能让“伪降解”消解“禁塑令”的效果

张海英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自今年1月1日“禁塑令”正式落地以来,各种传统塑料制品的应用替代产品开始在市场上广泛流通。其中,成本更低、体验感更好的可降解塑料制品一跃成为市场新宠儿,迎来井喷。但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国内目前尚未出台针对可降解塑料的强制性统一标准,可降解塑料市场混入不少“伪降解”。

从“限塑令”到“禁塑令”,体现了我国进一步遏制“白色污染”的决心。在禁塑方面,一方面要采取“堵”的策略,禁止生产、销售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塑料餐具等;另一方面,要采取“疏”的策略,以布袋、纸袋、可降解塑料袋等替代不可降解塑料袋,既能减少污染,也能方便公众。

从市场情况看,“最严禁塑令”的效果正在

显现,可降解塑料需求爆发就是证明。有生产可降解塑料袋的企业表示,“工厂已经满负荷生产,订单已经排到了3月份。”有研报指出,到2025年,预计中国可降解塑料需求量为238万吨,市场规模可达477亿元。

如此背景下,由于缺乏统一的生产监管标准,市场上出现了打着“可降解”旗号的“伪降解”产品。而“伪降解”实际上是“传统塑料材料+各种添加剂合成”,最终实际降解率低,达不到降解产品的需求和生化标准。

“伪降解”产品出现,一方面是商家受利益驱使。由于非可降解和可降解材料之间存在巨大的价格悬殊,这让一些不良商家看到了“商机”,以低于正常可降解塑料产品价格的“伪降解”产品来获取更多利润,同时打着“可降解”的旗号逃避监管。

另一方面是目前缺乏统一的强制性标准。虽然在可降解塑料领域有一些标准,但不同地区、不同企业采用的往往是不同的标准,

处”“潜移默化”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壤污染问题暴露时为时已晚。

再如,大部分重金属渗入土壤后无法自行吸收、降解或者迁移转化,必须通过一定的生物、物理或者化学手段人工修复干预,但修复的同时可能带来二次污染、土壤有机质被破坏等潜在风险,成本也普遍偏高。

2014年,我国发布的首份《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公报》指出,中国土壤总超标率为16.1%。从分布情况看,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其中西南、中南部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而这些地区正是近年来被曝光的“镉大米”问题的重灾区。

近年来,在土壤污染防治问题上,中央和

“镉大米”背后的土壤污染问题不容忽视